**主要参考书目：**

1. 刘军宁：《保守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2.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

3. 刘建军：《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4. 赵士林：《李泽厚思想评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5. 王炳权：《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浅析20世纪90年代中国兴起的“新保守主义”思潮**

倪雯 2013201475

【摘要】 1990年以后，“新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兴起，此时所说的“新保守主义”事实上仍然并非完全西方意义上的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的原因，是伴随改革开放进程引起的市场经济改革、政治变迁、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变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反思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与现实，思考中国的未来，重新面对中国的现代性，检讨自己的价值、立场，思索如何超越自身的局限性。从保守主义思潮到新保守主义思潮，与外在和内在两方面原因密切相关，也进一步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曲折与艰难。

【关键词】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告别革命；李泽厚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在1990年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卢梭的思想耳熟能详，卢梭的著作的中译本也是应有尽有，而柏克的思想则不为人们所知，书店里也没有柏克的著作，思想史的教材中没有柏克的位置。可以说，保守主义在近代中国是缺席的，中国只有“保守派”，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柏克式的保守主义者。1990年以后，“新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兴起，此时所说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事实上仍然并非完全西方意义上的“新保守主义”思潮。 西方新保守主义思潮在本质上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归，而中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是在吸收借鉴自由的大传统的同时，汇入了中国的固有传统。

1990年代中国政治思潮转折的最关键因素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因素对民族主义国家的冲击增强。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市场经济改革加快、政治变迁、社会转型、人们文化心理也发生了变化，全球化的浪潮澎湃汹涌，高科技竞争空间激烈，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具体说来，一方面冷战体系瓦解，意识形态冲突淡化，另一方面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文化冲突走向前台，全球化的逻辑一方面推进着一体化进程，使人类的经济甚至政治模式开始趋同，一方面遭遇着既有体制和民族主义的抵制。因此，在国内国际发生的巨大变革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不断反思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与现实，思考如何想象中国的未来，如何重新面对中国的现代性，如何检讨自己的价值、立场，如何超越自身的局限性等诸多问题，从保守主义到新保守主义，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探索的复杂、曲折与艰难。

（一）

在刘军宁的《保守主义》一书中，对20世纪90年代所兴起的“新保守主义”的思潮有以下表述：“曾有一股自称是‘新保守主义’的思潮在中国登台亮相”，“所谓的‘保守主义者’不过是新的保守派，或者说以保守主义面目出现的激进派。”[[1]](#footnote-0)若以西方真正意义上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为标准来审视中国的这股新的保守主义思潮，中国此时兴起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并非是完全西方意义上的新保守主义。所谓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新保守主义，首先，它是在对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国内的自由主义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产生并不断发展的；与自由主义一样，新保守主义将“民主”和“秩序”奉为现代民主社会的最高价值。其次，新保守主义不满足于用国际援助、道义宣讲等和缓的方式在国际上推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而是选择了更为激进的、以武力强行推动、甚至不惜走单边主义路线、单独行事的强硬手段：这是新保守主义与传统的现实的保守主义相区别的地方。[[2]](#footnote-1)冷战结束后，曾在上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大行其道的新保守主义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在美国共和党和保守主义阵营逐渐成为一支影响很大的力量；到2001年小布什上台，新保守主义者终于找到了与政策结合的渠道，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的新保守主义在国内体现为反对国家主义，保守自由的传统特别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传统，强调个人主义、受到严厉限制的政府和自由市场经济；在国际上则极力强调主权国家的自主性，宣扬强势文明的话语体系。因此，中国90年代以后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和西方新保守主义思潮在核心理论上的不同在于对自由主义的态度。

“新保守主义的‘新’至少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第一，它是保守主义在长期的消沉以至退让之后的重新兴起；第二，他对古典自由主义重新的、更为自觉的、更为密切的认同。所以，离开了古典自由主义就无法理解新保守主义”[[3]](#footnote-2)。20世纪90年代中国特别是中青年知识分子中，确实兴起了一种新的保守主义思潮，以主张民族主义、对抗西方文化为特征。其中的“新”主要体现在：第一，流行这种思潮的主体是中青年人，而不是像旧保守主义那样主体是老年人；第二，适应这一思潮的人，很多都在西方国家留过学，了解发达国家的情况，而不是像旧保守主义那样，很多人不了解外面的情况；第三，流行这一思潮的人，在主张民族主义的同时，也积极地倡导改革开放，而不是像旧保守主义那样往往对抗改革开放。通常所说的“新”常常立足于批判和差异的立场上，同时在一些理论观点上，90年代的中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与20世纪80年代的保守主义有着某种一致性的关联。主要表现在：“新保守主义也的确继承了老保守主义的一些立场，比如说，强调权威的必要性，对传统的高度认同，尊重道德、宗教和精神的价值……新保守主义在本质上和情绪上都是反激进主义的。在新保守主义者眼里，政治激进主义和乌托邦的冲动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瘟疫。”[[4]](#footnote-3)笔者认为，“保守”的本义应该是“保存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并且用现代精神来阐释本民族文化精髓这么一种主张”[[5]](#footnote-4)。此处的“保守”更多应该理解为“传统”，中西方不同的传统，决定了保守的对象以及政治主张的不同。因此要想真正理解此时期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就不能简单地将保守视为落后、反对的贬义词，而是努力对其做出一种更中性、更符合历史实际的解读。因此在对待传统、秩序和权威这些政治概念和资源的态度上，新保守主义思潮与保守主义思潮是一致的。

而在具体的政治构想和安排上，新保守主义与保守主义又并不一致。20世纪9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反思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历史经验，批判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主张回归传统，并以渐进改良方式实现社会转型。大致说来，中国学界主要以新保守主义来指1990年代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和经济上的东亚发展模式。强调在中国不应该完全像西方一样走向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应该具有一种集体精神性的权威主义，正是这种权威主义的集体向心力，成为东方模式、东方政治稳定和国家建设具有向心力的基本保证。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将新权威主义所具有某些特征看成是具有新保守主义的色彩的。因为，旧权威主义是强调通过强制和暴力维持社会秩序，新权威主义则强调通过法制和经济的发展来求得社会的平衡。这与新保守主义用过法治确立和维持秩序的确有相通之处。

提倡新保守主义的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多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形成了新保守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有李泽厚、王元化等。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的谈话录整理成了《告别革命》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引发了广泛争议。李泽厚曾经是革命的积极支持者，“文革”中期之后开始“告别革命”。李泽厚提出建立“以儒为主，儒道互补”的现代乌托邦，以解脱现代人的思想困境。[[6]](#footnote-5)此外，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貌似激进而实质上与保守主义异同同工的“新左派”，以西方后现代主义为理论依据，采取反现代性立场，认为中国已经实现了现代性，并且成为“资本化社会”，因此要站在后现代立场为中国已经实现了现代性，并且成为“资本化社会”，因此要站在后现代主义立场批判现代性，走非传统社会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第三种道路。他们在反对“后殖民主义”旗号下，主张摒弃西化，回归本土文化。20世纪90年代的保守主义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受挫后兴起的，他对启蒙思想的背弃，带来了现代性思想火种熄灭的危险。尽管，新保守主义有其冷静客观的一面，但对其显然不能评价过高，尤其是李泽厚先生对保守主义的肯定以及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否定，显然有失公允。这反映了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一分子的知识群体，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的巨大变革之后，遂中国未来文化和价值重建的一种“域外思索”。

（二）

中国大陆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产生并逐渐形成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决非偶然，其催生因素复杂多样。若进行归纳梳理，主要是由国际环境氛围和思想文化渊源和两方面原因。

第一，国际环境氛围。 众所周知，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政治舞台上相继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重大事件，989～1990年，东欧局势发生了激烈的动荡，急转直下的政局变化，令全世界为之瞠目。在短短一年多里，东欧的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和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6国，政权纷纷易手，执政四十多年的共产党、工人党或下台成为在野党，或改变了性质。紧随其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1992年3月在大选失败后下台；在南斯拉夫，先是南共联盟不复存在，原南斯拉夫联邦内的各邦都发生了剧变，其后在经历近一年之久的内战后，于1992年4月最终分裂为五个独立的共和国。伴随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在经济上，否定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开始实行混合所有制或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剧变后的东欧各国，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人们纷纷对既往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进行反思，对各自民族的现代化道路进行重新审视与抉择。 在某些西方思想家看来，东欧和苏联的剧变，标志着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失败，意识形态冲突明显让位于经济竞争和文化冲突，民族和宗教问题从幕后走到了前台。 在这种背景下，思想界骤然掀起了保守主义思潮，开始对“激进主义”的清算，政治的多极化、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化的民族化齐驱并进。 处于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思想文化理论界也必然地受到这种世界性思想潮流的影响。

第二，思想文化渊源。如何处理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始终是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鸦片战争开始，伴随着与西方国家冲突的一次次失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面临民族危亡的形势下，从器物到制度直至精神观念，不得不痛苦地选择了背弃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方向。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背离传统的趋势愈演愈烈，这种趋势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 然而，近现代中国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放弃自始就是被迫的，对于像中国这样具有深厚传统和众多人口的国家来说，完全背离传统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因此，一旦有适宜的条件，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必然还会被提出，而且这一问题也必须在中国走向现代过程中予以正视和解决，这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重新兴起的思想文化渊源。就国内而言，“新保守主义”思潮逆转了８０年代“文化热”的主导思路。９０年代 中国的现状是：社会转型，价值中心离散，文化失范，话语系统多元而使人焦虑不安，不知所从。８０年代的情况远不像现在这样严重，当时的思想还有个聚焦点——现代化，那时的感情还因现代化而冲动，思想文化界还活跃着众多借启蒙主义呼风唤雨的文化英雄。“文化热”在８０年代中期兴起，一时热透了半边天。传统与现代，或民族化与现代化，在启蒙主义者那里，相对而又相融，但重心、主旨在现代化，这在当时是一个最为时髦的中心话题。而到了90年代，启蒙话语成了众矢之的，反“现代性”倒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三）

社会政治思潮与改革同步，与问题伴生，与西方社会思潮相关联；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多元化走向，诉求意蕴明显：与政治倾向和话语体系相联；不断从边缘走向中心，容易主宰某一时期人们关注的重心和话题。政治思潮产生和变迁与外在和内在两方面条件密切相关，外在条件包括，政治学在中国的恢复和发展、社会变革推动、知识群体的介入、知识生产、传播体系的改革；内在动因有多重，其中从最直观的角度视之，政治思潮乃是只是群体介入政治发展进程的一种反映。政治思潮的变动是文化权利与国家权力之关系的一种映射。

当代政治思潮与近现代政治思潮有很大的不同。当代政治思潮的兴起、变迁明显地受制于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力度。换句话说，当代政治思潮并不能按照自身的逻辑随意发展，而是受国家权力和政策影响。这种外在外在约束使当代政治思潮的兴起和变迁只有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逻辑中得到有效的说明。当代政治思潮与近现代政治思潮最为明显的不同，便是供其思考的对象是有差异性的。近现代思潮主要是围绕古今之变，在“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和中国政治建设的道路。由于是在一种非同一性的政治体系之中展开的，故其反思的对象不仅仅是既定的政权体系，更是要针对流传已久的文化传统。所以，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潮，大都不自觉地包含着文化（文明）决定论的色彩。当代政治思潮尽管没有完全摆脱“古-今”或“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但从其反思的对象来说，文化传统已不再占据重要地位了，试图通过思想的力量改造或完善既定的政治体系才是其紧要的任务。由此导致了近现代政治思潮可以按照思潮本身的逻辑，展现着一种特有的精神魅力。而当代政治思潮却要在与既定政治政治体系的关系中，通过“迂回话语”展现着一种矛盾而复杂的面貌。

1. 刘军宁著，《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64页。 [↑](#footnote-ref-0)
2. 李永志主编，《简明国际知识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第345页。 [↑](#footnote-ref-1)
3. 刘军宁著，《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46页。 [↑](#footnote-ref-2)
4. 刘军宁著，《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第247页。 [↑](#footnote-ref-3)
5. 马立诚著，《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10页。 [↑](#footnote-ref-4)
6. 杨春时，《作为现代性思潮的保守主义评说》，湖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footnote-ref-5)